以開放聚合之力 啟亞太合作新程

灣區風正勁，太平潮湧來。亞太經合組織（APEC）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深圳舉行，來自21個APEC成員經濟體以及多個域外經濟體的政商界代表匯聚一堂，圍繞「建設亞太共同體，促進共同繁榮」主題、「開放、創新、合作」三大優先領域，共商合作大計、共繪發展藍圖。選擇在深圳這座因開放而生、因創新而興的城市舉辦APEC會議，中國向世界傳遞的信號不言而喻——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、深度融入亞太、同各方共享發展機遇，為共建亞太共同體匯聚磅礴力量。

萬喆 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研究員 博士生導師

「建設亞太共同體，促進共同繁榮」是21個APEC大家庭成員一致同意設置的主題。當今世界，單邊主義、保護主義持續抬頭，全球化面臨空前挑戰，個別國家把關稅當工具、把產業鏈當籌碼，大行「脫鉤斷鏈」「小院高牆」，侵蝕着來之不易的區域分工體系；地緣衝突延宕反覆，經濟議題愈來愈多地被安全化、武器化；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突破，新技術在創造增量的同時，也在拉大數字鴻溝。以上三重壓力疊加，導致亞太合作面臨不進則退的考驗。

亞太合作：不進則退

然而，亞太依然是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版圖。這片土地承載了全球近40%的人口，貢獻着約60.7%的經濟總量，貿易總量約佔全球一半。2025年區域貿易總額增至約26萬億美元，今年區域經濟增長預計3.4%，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。APEC成立37年來，成員國平均關稅從17%降至5%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釋放的紅利，正支撐着亞太成爲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。

快速增長的數字背後是APEC一以貫之的「開放融通」價值底色，也是亞太創造增長奇跡的根本「密碼」。幾十年來，亞太地區能夠長期成爲全球經濟增長主引擎，關鍵在於堅持多邊主義、摒棄零和博弈，走開放合作、互利共贏之路。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、夯實互聯互通根基，就是要持續拆除壁壘、暢通循環，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蛋糕愈做愈大，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經濟體人民。

中國主張：回應亞太所需

作爲東道主，中國把「開放、創新、合作」確定爲三大優先領域。六個字看似平實，指向的卻是亞太當下最緊迫的三個命題：怎樣開放、怎樣增長、怎樣發展。

開放是亞太繁榮之基。中國的主張一貫且明確，反對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，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爲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，營造開放型區域經濟環境。早在2013年的印度尼西亞APEC巴厘島峰會上，習近平主席就提出：「太平洋之所以廣大，是因爲它沒有任何自然阻隔，我們不應該爲它設定人爲的阻隔。」時至今日，把亞太經濟的汪洋分割成一個個小湖泊，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。

創新是亞太繁榮之源。中方主張，既要抓住人工智能、數字經濟帶來的增長機遇，培育新質生產力；也要共建開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，讓人工智能向善、惠民，在開源生態、數據流動、智慧海關、跨境電商等具體領域形成可操作的規則和平台，幫助發展中成員和中小企業跨過技術門檻。2018年，習近平主席赴巴布亞新幾內亞出席APEC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就指出，「科技創新成果不應該被封鎖起來，不應該成爲只爲少數人牟利的工具。」創新理應成爲亞太共同的增量。



●亞太經合組織（APEC）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選址深圳國際交流中心。 新華社

合作是亞太繁榮之根。亞太的魅力在多樣性，21個經濟體發展階段不同、制度文化各異，把多樣性轉化爲合作動力，靠的是和而不同、互利共贏。習近平主席曾說：「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眞發展」「世界繁榮穩定不可能建立在貧者愈貧、富者愈富的基礎上」——中國的主張歷來是做大合作蛋糕而不是爭奪份額，中國也不會走贏者通吃的老路，而是行各方共贏的大道——不斷加大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支持，擴大在糧食安全、能源安全、財金合作、中小企業、人力資源等領域合作。

中國主張的底色充分展現了APEC的初心。從「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」「共同營造開放型區域經濟環境」，到「共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」「共同推進貿易數字化綠色化」「共同促進普惠包容發展」，五個「共同」，落點都在一個「共」字。從牢固樹立亞太命運共同體意識，到共建互信、包容、合作、共贏的亞太夥伴關係，主線始終是把亞太視爲休戚與共的大家庭。這同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一脈相承，也同APEC的初心高度契合。

中國貢獻：將承諾轉變為成果

東道主的分量最終要靠成果稱量。一年來，中國以約300場會議和活動的扎實籌備，把「中國年」辦成了「行動年」。

從制度供給層面，5月，APEC貿易部長會議在蘇州發表聲明，成爲「中國年」首份部長級成果文件；會議批准《APEC創新、有競爭力和韌性的服務業路線圖》，爲未來十年服務貿易合作確立指引。7月，數字和人工智能部長會議在成都通過聲明，「數據」首次被單列爲議題，「開源」首次提升至部長級合作層面。海關、交通、能源、糧食、人力資源等領域部長會相繼舉行。今年以來，中國與APEC經濟體達成近50項經貿領域務實成果，其中貿易數字化、人工智能等領域25項，佔了「半壁江山」。

從平台搭建層面看，中方在深圳前海設立「促進APEC數據跨境流動合作中國中心」，在廣州設立亞太人工智能賦能中小企業發展合作中心，在深圳建設亞太中小企業合作區。正式啟動的APEC無紙貿易卓越中心，牽頭推進貿易數字化合作框架制訂；牽頭的亞太示範電子口岸網絡再次擴員，已覆蓋13個經濟體的26個口岸。這些看得見、用得上的公共產品，比任何宣言都更有說服力。

從市場開放層面看，2025年，中國與APEC經濟體貿易總額達3.7萬億美元，佔外貿總額57.8%，已成爲13個APEC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伴；中國自APEC經濟體引資906.1億美元，對APEC經濟體投資1,365.8億美元。今年前三季度，中國對APEC其他經濟體進出口24.07萬億元，增長23.9%，佔外貿總值的60.3%；其中高技術產品進出口6.66萬億元，增長50.3%，貢獻了雙方近一半的貿易增量；「新三樣」產品出口增長37.1%，自APEC經濟體進口電子元件增長56%。

從規則對接層面看，中國已與31個國家和地區簽署24個自貿協定或經貿安排，其中APEC經濟體15個；高質量實施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》，推動加入《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》《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》，推動中國—東盟自貿區3.0版升級議定書盡早生效。在秘魯，中秘共建的錢凱港上半年集裝箱吞吐量達20萬標準箱、同比增長70.94%，正在重新連接太平洋東岸的物流版圖。

中國之所以拿得出這些，根子在自身發展。今年是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開局之年，中國正以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的確定性，爲亞太提供市場、投資、創新和綠色轉型的機遇。中國的發展根植於亞太的開放沃土，也必將持續賦能亞太的繁榮進步。

中國始終是亞太開放合作的堅定踐行者、積極貢獻者。作爲本次APEC東道主，中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，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，持續優化營商環境，不斷釋放超大規模市場機遇。APEC成員有理由相信，深圳APEC會議將成爲新起點，各方將秉持APEC初心，堅持眞正的多邊主義，以開放消弭隔閡、以創新破解難題、以包容化解分歧，拉緊利益紐帶、深化務實協作，共同書寫亞太繁榮新篇章，爲動盪變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、正能量。

中央授權行政主導 認清香港政制之本

文平理
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昨日在大公報發表題爲《政體源於中央授權 行政主導不容歪曲——正本清源認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之本》的署名文章，針對香港社會近年出現的政制誤讀，從憲制根源、法律條文與立法原意三個維度，以香港基本法爲依歸，以「政體法定、政體央定、行政主導、誤讀根源、監督問責」五個層面層層遞進，系統闡明香港實行行政主導體制的法理依據與憲制秩序，正面擊破「三權分立」論述的迷思，值得社會各界深入領會。當前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已全面落實，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，唯有牢牢把握行政主導這一核心，才能維持特區憲制秩序穩定，保障香港長治久安，推動「一國兩制」行穩致遠。

憲制性法律不容任意解讀

鄧中華開篇即指出，特區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，是憲制性法律白紙黑字寫定的，不是任何人隨意說什麼就是什麼。基本法序言、第一章「總則」、第二章「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」明確了大的原則精神，第四章「政治體制」及附件一、附件二更對特區政治體制方方面面作出明確具體規定。文章強調，人們當然可以解讀，但不能天馬行空、根據自己的意願和偏好隨意增添或減少內容，更不能有意歪曲。

這一論述清楚表明了，行政主導是源於憲法、植根於基本法立法原意的核心制度設計，任何解讀都必須回歸基本法的文本文字和立法原意。香港社會長期存在一種頑固誤解，以爲回歸後實行的是西方意義上的「三權分立」，這種錯誤認知混淆了制度本質，更在近年被反中亂港勢力刻意利用，作爲削弱行政長官權威、挑戰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思想武器。文章正是對這一迷思的徹底澄清。

授權邏輯不容顛倒

文章的核心論證在於授權邏輯。根據憲法和基本法，規定特區實行什麼制度包括政治體制是中央事權，由中央決定；特區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都來源於中央授權，三權之間什麼關係、職權職能如何劃分，取決於中央。基本法第2條規定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、立法權、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，這些權力都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」。鄧中華指出，基本法先明確中央授權，再談當地的權力配置，這是特區憲制秩序的核心問題——特區三權同出一源，都來自中央授權，是中央統一授權之下承擔不同功能的三個機關，本質上是授權體制下的職能分工，並非西式分權制衡體制，與主權國家原生分權有本質區別。

文章進一步指出：中央有無可能對特區三機關平均授權、以達至「三權分立」的狀態？答案是否定的。這一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「三權分立」在香港的適用性——分權的前提是主權在先，授權的前提是主權在上，香港不是主權國家，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，並不擁有原生性的主權權力，根本不可能實行「三權分立」。鄧中華又引用基本法條文詳細說明，中央通過基本法規定了行政主導，沒有「三權分立」的空間；基本法對行政主導的安排，體現在具體條文，並非口號或者抽象概念，是一套完善的制度設計。

「三權分立」乃偷換概念

鄧中華分析，有人堅持把香港政治體制說成「三權分立」的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簡單套用主權國家的分權理論，把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個機關視爲地位平等的權力中心，彼此分立、制衡，並把行政長官僅等同於行政部門的首長；二是過去香港確實有一股勢力，一直圖謀在基本法之外「重塑」香港的政治體制，把「行政主導」做成事實上的「三權分立」，主要表現除了濫用司法覆核外，就是推動立法無限擴權，立法會一度被反中亂港分子綁架、帶節奏甚至主導，同時把行政做小做弱，使香港愈來愈偏離基本法的軌道。

文章強調，把中央授權之下三權之間的職能分工解讀爲「三權分立」，是偷換概念，把扭曲運作的假象當成憲制本身的制度設計，這正是長期誤讀的關鍵源頭。因此，香港社會各界應清楚、深刻認識到，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，是憲法與基本法明文確立、由中央設計和決定的行政主導體制，其本質是中央授權之下的職能分工，絕非西式「三權分立」。釐清這一憲制本源，不是要否定依法監督，而是要堅定憲制原則、劃清法理邊界，讓行政、立法、司法各機關恪守憲制定位、各司其職、同向發力。

軟硬聯通協同發力 推動灣區高質發展

計艷莉 貴州省政協委員 香港貴州商會會長



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廣東中山考察，強調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五中全會精神，把全會作出的各項決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實處，以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新成效，更好推動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，奮力開創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新局面；並強調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，廣東肩負着重要使命，珠江口兩岸的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東莞、中山等地要發揮先導作用。此次考察，正值國家「十五五」開局之年尾聲，以及深圳APEC會議召開。習近平主席考察廣東中山，是對大灣區建設階段性成果的高度總結，爲大灣區下一階段高質量發展指明路向。

交通一體化是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骨幹基礎。習近平主席考察深中通道西人工島時指出，深中通道在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中發揮了開路先鋒作用，要進一步把這一超大型交通工程管理好、運營好，使其更好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。大灣區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一的土地、百分之六的人口，創造出全國約九分之一的經濟總量，基礎設施聯通帶來了強大的集聚效應，做到路通財通。近年港珠澳大橋、南沙大橋、深中通道等相繼通車，珠江口東西兩岸的時空距離大幅壓縮，更令「東岸研發、西岸產業化」的美好設想開始具備現實條件。

科技與產業融合是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能。習近平主席在中山市翠亨新區的灣區未來科技城考察表示，要下大氣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，不斷邁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新步伐。灣區未來科技城以「深圳科創＋中山智造」「深圳研發＋中山轉化」模式，開園不足兩年已引進30家實體企業，包括上市公司和國家級專精特新「小巨人」。這一模式之所以能夠跑通，關鍵在於它以改革創新的方式，拆除了科研與產業之間的體制壁壘，讓實驗室的突破能夠在生產線上快速轉化爲產品與產能。

習近平主席此次考察廣東中山的基建和創新等重點領域，明確了大灣區高質量發展路徑。香港在「十五五」時期需更好與廣東協同發力，全面對接大灣區高質量發展。

習近平主席的考察指明了基建聯通對大灣區聯通融合的重要意義。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跨境基建，是香港參與大灣區交通一體化的重要環節。作爲北都的重要基建之一，北環線主線及支線已全面進入建設階段，目標於2034年或之前開通，屆時往來新田與新皇崗口岸僅需約11分鐘。北環線與新皇崗口岸的對接進度、港深西部鐵路的興建進展，將推動香港與深圳的創新資源實現無縫銜接。

香港擁有堅實的基礎研究實力，多所大學在人工智能、生物醫藥、先進製造等領域具備國際競爭力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，是促進大灣區創新實力的重要平台，有利帶動資金、數據、科研樣本的跨境流動、效率提升，並爲跨境創科協同提供可複製推廣的制度經驗。其中，香港園區下月將迎來開園一周年，深圳園區更已集聚500多家科技企業、超過15,000名科研人才。香港要以河套爲載體，將基礎研究成果與大灣區完備的產業鏈對接，打通從研發、中試到量產的完整鏈條，讓香港的科研優勢在大灣區的產業場景中落地。在北都「硬聯通」的基礎上，香港需同步推進規則機制的「軟聯通」，讓交通優勢結合創科實力，眞正轉化爲生產要素流通的效能，讓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做深做實。